

“何为灾难?”：人类学对一个持久问题的观点

[美]安东尼·奥利弗-斯密斯/著 彭文斌 黄春 文军/译

[摘要]灾难的定义,如同文化之概念,纷繁驳杂,无清晰之定论。斯密斯认为,灾难定义的不确定性并不妨碍学术的研究,其持续的争论恰好说明灾难研究领域的活力。灾难定义之争表现为:(1)主观性和客观性;(2)常态与非常态;(3)社会与环境。斯密斯认为,社会与自然环境的互动是灾难研究的要点,而人类学之传统的适应(adaptation)观念或其对立面——适应性缺失,也即脆弱性(vulnerability)为解释灾难因果与过程的关键。人类学需要强化从政治生态的角度来研究人、环境和社会政治结构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灾难的定义;人与环境;适应与脆弱性

中图分类号:C9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13)12—0001—07

作者简介:安东尼·奥利弗-斯密斯(Anthony Oliver Smith),男,美国灾难人类学研究学者,佛罗里达大学人类学系教授,联合国灾害应对咨询专家,研究方向:灾难人类学理论、拉美自然灾害和社会文化影响。彭文斌(1963-),男,四川双流人,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重庆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人类学中心资深访问学者,研究方向:西南人类学、灾难人类学和康藏研究。重庆 400030 黄春(1963-),女,四川达县人,西南民族大学预科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英语教学和翻译。四川 成都 610041 文军(1965-),女,四川都江堰人,陕西历史博物馆壁画保护修复研究中心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佛教艺术。陕西 西安 710061

从社会科学的视角研究灾难已经持续了近70年。在这一时间跨度内,从一系列的源头形成了诸多概念和主题性焦点,从不同的方面对整个研究领域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从普林斯(Prince)对(1920)哈利法克斯港军火库爆炸的早期研究,到战时轰炸中的人群经历研究,再到自然灾害的社会影响以及紧急救助和重建中所使用的系列工作定义来看,对灾难的定义很少取得共识。在一些学术圈里,共识的缺乏已经让学者们对灾难研究领域的健康发展产生了忧虑。^[1]

不过,某一研究领域的知识生命力并不一定需要建立在某一概念或定义的共识之上,比如在人类学界,克鲁伯(Kroeber)和克拉克洪(Kluckhohn)在文献检索之后,发现人类学的主要观念——文化有164种不同的定义。^[2]自他们之后,对文化概念的争议涉及了一些核心元素,如文化的物质或意识形态基础、文化研究的正确方法,以及文化研究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这些论辩产生了全然不同的研究问题与方法。尽管人类学家们也许现在所使用的文化定义相对减少,但几乎从来没有就其概念达成完全的共识。不过在概念的问题上缺乏一致或共识并没有导致知识的停滞。实

际上这些争议才是普遍意义上的科学和人文探讨的精髓。在我看来,关于学科基本观念的持续话语,不仅对学科领域的整体性毫发无损,而且也没有削弱学科的研究事业。虽然也有人存在着分歧,我认为人类学目前的状态是健康和充满活力的。人类学常常涉及的、广泛的内省也刺激和推动了新的理论、方法和研究问题。

虽然文化或灾难涵义缺乏共识不是让我特别忧心的事情,我并不就此认为“何为灾难”的问题就毫无意义,灾难定义争论的重要性就在于目前灾难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它促使我们去探讨过去和现在灾难呈现的范畴,新形式的灾害出现和急剧变化的人类-环境关系与状态可以对此加以佐证。定义上的共识也许不如引发讨论更重要,争辩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不过可以澄清关键性的问题,形成新的观点与问题领域,更重要的是探索新的实践潜能。实际上,如果能够以合适的知识和方法流程来推动有序、系统的研究,多元的定义并不一定会对某一领域造成危害。在本文中,我拟对灾难定义中本身的一些困难作些回顾,并涉及定义论争中的一些关键性问题。在此基础上,我将描述出人类学对灾难定义的贡献,并主张发展

灾难研究的政治生态学。^①

一、灾难:变化与复杂性

为什么对灾难的定义如此难以达成共识?一方面,灾难这个词在流行说法里被广泛运用,许多事件与过程在口语中被称为灾难——牵涉诸多层面,从失败的社会事件到地区性的飓风。通俗与书面语对该词的使用各式各样,涵盖了系列广泛的现象、概念、比喻和暗喻等,要达到准确、明晰,或许更重要的是,科学意义上的简单明了是一个挑战性的问题。同样地,对该词的通俗使用和解读,偶尔也会显示出未被纯客观尺度观察到的有关灾难的关键性范畴。

由于灾难是由外部变化和内部的复杂性界定的,灾难所呈现的概念性挑战有双重的。外部的变化指的是自然和技术领域里一系列“客观”现象产生或触发灾难,形成非常不同的物质影响。灾难这个词包含广泛,被用来指代事件/过程,涵盖缓慢发展的旱灾和中毒,到进展很快的地震或核泄漏事件。外部变化也包括灾难的影响幅度,如飓风这样带来瞬间毁灭和死亡到也许多年都难以直接观察或感受到的,如中毒的情形。因此,单是外部变化几乎就让分析者难以建立一套普遍的定义特征来涵盖灾难中形成和产生的系列广泛现象。

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提醒我们,语言,尤其是在应对涵盖范围宽泛的类别时,很难绝对精确地表述。他建议对于这样的类别或概念,最好是用“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一词来概括。根据他对概念游戏的讨论,我认为灾难构成了一种“家族”,从其系列广泛现象中显现的是“一种错综复杂的互相重叠、交叉的相似关系的网络:有时是总体上的相似,有时是细节上的相似。”^[3]维特根斯坦用了纺线的比喻,纤维不断地重叠,不过没有一丝从整根线中穿过。这根线的特点——将比喻扩展,其力度就在于经过该线的不断叠加起来的丝线。而且,也无必要确立定义标准的界限,以使系列家族相似可以用来作为一个概念。当然这并不是说不需要划定界限,在用于特殊目的也需要有界定。除此之外,无需为了使一概念有用而画地为牢。

多元且相似的灾难定义完全是源于形形色色的灾难研究的具体目标或关怀。以行为为重点的研究者在定义灾难时会不同于那些关注社会—环境互动的人。涉及灾难管理或重建的机构则设定可操作性定义,以便使它们可以参与符合其标准

的事件和过程。因此,“灾难”一词构成一组“家族相似”而非遵循一一定义标准的有限清单。该概念具有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模糊的边缘”(blurred edges),然而,其定义的非严谨性,并未导致其失去效用。

定义之争中还有一项关键性的成分,即灾难内部的复杂性。在一场灾难中受到关注的是一系列交汇的过程和事件,如社会、环境、文化、政治、经济、物资、技术等,在不同的时间跨度里如何产生的。灾难是整体性事件,伴随它们的展开,某一社会结构形成的各因素及其与环境的总体关系都会被牵涉进去,受到影响并得到关注。这些因素表现出连贯和非连贯、和谐与矛盾、合作与冲突、霸权与对抗。它们展示的是物质、生物和社会系统的运行及其在人口、群体、机构与实践中的互动,以及相伴而生的社会文化建构。像少数别的现象,灾难的内部复杂性迫使我们面对社会构建的现实的多面性和多变性。其复杂性嵌于多元的视野中,其差异如同在事件和过程中受影响或参与该过程的个体或群体。灾难所采取的多种形式、实践和建构也引起了诸多学科的多元解释,每一学科在方法工具和理论与实际目标上都有很大的不同。

灾难的外部或客观变化及内部或主观的复杂性与概念的争议有着密切攸关的关系。在维特根斯坦以后约十年的样子,盖列(Gallie)认为“一些概念从根本上来说是具争议性的,如何运用得当对于使用者来说无疑会引起无休止的争论。”^[4]同样,“艺术”或“民主”这样的概念,不同的人对其使用和特殊情形或场景的运用也会产生分歧,各方都会提出有说服力的观点和论据来支撑其理解的正确性。

于此,我认为,灾难不是一些固定的、可以严格界定的现象,而是一具争议性的概念,其边缘模糊,构成了系列广泛的物质和社会事件与过程的“家族性近似”现象。

二、定义争论的因素

从费力兹(Fritz, 1961)、贝克(Baker)和查普曼(Chapman)(1962)以及巴藤(Barton, 1969)的研究开始,社会学家和地理学家们对灾难的定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②卡南特力(Quarantelli)对过去30年来的相关文献作了回顾,对学界缺乏定义的共识表示关注,他注意到灾难被从下列几个方面被界定:(1)物理因素;(2)物理因素的自然界影响;(3)物理影响的评估;(4)由带物理影响的事

件而引起的社会混乱;(5)在感知的危机中社会对现实的构建,或许会和或许不会涉及物理方面的影响;(6)某些危机状态的政治定义;(7)危机状态下的需求能力比(demand-capability ratio)的失衡。^[5]卡南特力注意到从他的早期分析以来,总体情况并没有多大变化。

在某种程度上,多数情况下由社会学家参与,地理学家和政治学家也有涉及的定义辩论处于相对停滞的局面是真实的。不过,随着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科界里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态视野的兴起,目前论争开始变得激烈起来。在70年代,许多人类学家和文化地理学家们开始扩大灾难研究的聚焦点,将其纳入更深一层的时间框架中。他们借此开启了理论和实际(政治)问题,开始将灾难更多看作是现行社会秩序、人与环境的关系,以及历史结构过程的运作,而不单单是地理物理的极端结果(地震、飓风、干旱等)。他们引入的问题似乎目前更强调社会本身在灾难中作所起的作用,而非停留在混乱和破坏的事实层面上。现在的定义论争围绕的是关键性的社会因素如何被衡量或加进定义之中,以及据此怎样确立研究性问题。因此,与卡南特力先前对灾难理解的列表相比,实际上对灾难究竟是什么一系列共同的关注点已经出现。不同于差异很大、造成对灾难歧见的定义标准,现在讨论的焦点集中于具体问题所形成的不同重点(或某些情形下为名称)。

三、客观性与主观性

在定义争论中还受到关注的是灾难的问题究竟是一客观、可辨的现象还是主观的社会建构过程,即灾难是一组自然界的的影响还是社会建构的观念。一些研究者认为灾难并非一通过某些具体的物质和时间特点可以辨识的稳定的实体,而是一相对的事件即伴随不同的受灾群体的多元视野而呈现差别。这一提法使“灾难”一词可用于社会建构的状况或事件,其中所发生的多为很大程度的社会混乱,而非损毁,这也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哪些现象应包括在灾难的范围内,哪些应被剔除出去。

将灾难定义为社会建构的危机,其间阐释和意义的模式而非物质结构处于濒危状态,这样的定义隐含的意思很宽。这一取向偏重于将心理文化的影响视为灾难的主要特征,认为对物质或基础设施的损坏问题的强调并没有触及灾难的关键部分。在别的研究中对物质损毁的重视在这一取向中也许仅仅被视为作为灾难本质的社会心理或

心理文化的诱导因素。该定义倾向于灾难对认知和文化的错位和干扰作用,涉及系列现象,包括如五级飓风、化学品或原油的泄漏、恐怖分子的袭击、流行病或甚至是工厂倒闭所产生的影响,其宽泛和心理认知基础,可以延伸到下列现象——某一结构性调整项目、艾滋病、俄克拉荷马城市爆炸案^③、三里岛核事故^④、瓦茨暴乱^⑤、信贷危机、1985年墨西哥城地震、安德鲁飓风和博帕尔毒气泄漏。^⑥这些定义在许多事件和过程中推进了比较研究的可能。同样,将如此众多的现象纳入灾难的框架里也许也会模糊现象之间的明显差异。

其他力图平衡——将社会混乱、物质损害和心理错位视为定义灾难特征的方法包括的内容较少,它们强调物质损坏,不过也纳入系列广泛的事件和过程。克里普斯(Kreps, 1995)明显想纳入系列广泛的现象,“涉及社会混乱和物质方面的损坏……开放界限以便纳入环境、技术和社会政治事件。”^[6]因此,除开自然和技术性事件/过程,形形色色的内乱也被纳入灾难的范畴。不过,克里普斯的定义则排除了这样的社会现象,如经济危机、工厂倒闭,或者还包括计算机/高技术的失败——除非它们触及损毁或道德的某些具体形式。

四、非常规性与社会嵌入的事件

灾难定义讨论中另外一个问题涉及的是灾难的非常规性。灾难通常被描绘成具有非常规、不稳定的特性,导致不确定、无秩序和社会文化的崩溃。这种描述显然侧重于将灾难与日常的现实区分开来,后者清楚了或潜在地具有很高程度的可预测性。灾难扰乱了正常生活、颠覆了社会结构与适应性,给世界观和意义系统也造成了危机。^[7]

尽管对灾难非常规性的强调似乎接近普通常识,不过这些描述看起来几乎采用的是对灾前社会总体平衡的功能主义假设。这种假设的危险在于忽视了多数的灾难最后都可以用常态来理解,也即人们在其自然环境中碰到的风险大多是可控性的,不过日常生活的形式和结构,特别是那些与第三世界社会的不利处境相连的形式与结构,加剧了风险和灾难的影响。就此,贺维特(Hewitt)曾指出,思考模式上存在着“一种未经检视过的正态假设。”^[8]

五、灾难的环境与社会定位

这些争议的问题中下一个,也许可以说是最

重要的,是“定位”(location)问题,也即灾难是位于社会还是环境之中?目前在社科界有相当的共识——聚焦于自然或技术环境的因子(如飓风或石油泄漏)的定义,也即被贺维特称之为“危害模式”(hazards paradigm)^[8],消减了对根本性的灾难社会特性的关怀,阻碍了定理与理论建构。不过,“危害模式”具有很强的韧性,虽然遭到抵制,但对社会学研究具有很久的影响力。

灾难的社会与环境之争提出了被称之为“什么-为什么”(what-why),即在某些人看来,为“果”和为“因”的问题。也就是说,定义的目的是说明灾难是什么或做什么,还是解释为什么灾难会发生?一些研究者不认为脆弱性与定义灾难有关。在他们看来,脆弱性的概念聚焦于整个社会和环境条件下理解灾难,更适合用来解释灾难的起源和原因而不是用来定义灾难。卡南特力认为“我们应避免将灾难的特征与灾前的状况和灾后的结果混淆起来。”^⑦与此相反,他们要求灾难的定义按照特定空间和时间里人们和群体的行为来界定。社区观念和应对,包括机构的参与,因此就成了定义灾难的关键。灾难于此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一行为现象,定义的问题主要是通过个人、群体或机构表现出来的损毁或破坏场景下人类和群体的行为。在这一研究取向中,灾难成为了系列源于社会的结果。

六、人类学视野中的灾难及其争议

虽然从20世纪50年代起灾难成为一个实质性研究领域获得学界的认可和人类学家们的学术参与^⑧,学者们在很大程度上不太讲究理论,也未牵涉进定义的问题之中。他们更倾向于研究传统社会的居民如何应对具体的事件和关注灾难如何揭示社会组织的理论性问题。不过,华莱士在对沃塞斯特飓风的研究中,建构了灾难的时空模式,将其视为一种行为事件。华莱士在分析中认为,灾难是一系列时间阶段和空间范畴界定的事件,每一时空点都是与不同的活动和角色相连,后者嵌于灾前系统和事件本身导致的状况之中。^[9]对于这些早期的研究者来说,界定什么是灾难看起来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问题。不过,尽管人类学很少具体讨论定义的问题,也分享了其他社会学科研究灾难时的很多焦点和问题,因此定义争论的许多方面对于人类学界并不陌生。

从我作为人类学家的观点来看,以行为或社会心理词汇来定义灾难并将其用于系列广泛的现象,并不存在什么问题,条件是采纳的定义标准

需清楚了,事件/过程也需细节化。实际上,行为定义对于个人、群体、组织的行为方面和社会理论都形成了不少有意义的研究,而且对灾难的实践也有重要的启示。不过,最近我发现大体上行为的定义,对作为人类学家的我感兴趣的多数问题,也许提供的更多是研究的中点(mid-point)而非起点。这些问题涉及的是在以下几个方面灾难对于社会的揭示:(1)社会内部的社会与经济机构;(2)外部的社会 and 环境的能动关系;(3)社会整体的适应特质;(4)这种知识怎样被用来减少灾难的脆弱性和破坏性。在我的研究中暗含一种假设,如同它们所处的环境,灾难深深嵌于社会结构和社会的文化之中。在某种意义上,灾难可用昭示某一社会在其社会、经济以及改造过的环境中整个适应策略的状况。

适应(adaptation)曾经是也仍然是理解人利用物质环境的一个核心概念。人类学的基本教材通常都把该概念表述为个人和群体(社区、社会等)为了生存和繁育而采取的应对自然和文化环境的社会文化策略。社会文化系统是一人口群适应环境的主要手段,它使一社区从其环境中获取食品、住房、水、能源和其他必需品,在某种程度上,应对和减少与环境交汇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以及给人造成威胁的力量。在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中,人类必须处理好两个基本问题:满足人们需要的自然资源和人们为生存需调适和应对的系列挑战。换句话说,人类如果要生存和繁育,就必须合理开发资源和有效处理环境问题。环境问题包括非生物力量(温度、降水量、地形、水等)、生物力量(主要是动植物),以及与当地人口竞争或合作的别的人群的挑战。

适应进程的展开主要有两个方面或沿二条轴线。第一个方面涉及的是个人与团体,或不同构成的群体之间的交汇。对个人是适应的也许对群体来说不适应,反过来也是如此。也就是说,个人在使用资源,如水时作出的选择也许会损害集体的利益,集体的选择反过来也许也是如此。怎样选择在人类中不全是生物适应的问题,而是带有文化的,更具体点说,政治的色彩,折射出社会的权力关系,以及权力怎样被纳入财富与地位的范畴里。第二方面涉及的是在相近的时间框架里的选择和行为问题,也许会产生无法预期的长期的适应性影响。实际上,一个社会——作为寻求物质和非物质需要与满足的个体和群体连接起来的网络,应适应于其自然和文化的环境。社会与其环境互动并对其加以改变,涉及系列的过程社会

自身没有绝对的控制和完善的知识,在长时段内更是如此。

尽管人类社会不断扩大,复杂性也不断增加,但是在长时段里并没有受影响地吸纳或消解整个环境所带来的形形色色的危害。形成灾难的建构、改变或自然环境里的力量和状况是社会必须,却并非总是应对的适应性挑战形式。只要是无法完全对抗每一次威胁,所有的系统都在不同程度上会经历其内在的脆弱性。比如,社区的建立通常是以接近资源为基础,增加了生存的机会,不过经年累月也会发现,靠近资源的地方也有靠近灾难的风险,于是就必须采取措施应对灾难以使社区能承受其影响。而且,仅凭我们社会和技术系统的复杂性就常常因构成系统的多种成分之间的移位而造成危险。灾难——无论系统对其运作的好坏,都是衡量社区整个适应成败的标尺。不管我们是下意识还是无意识、有意还是无意,在我们与环境的交往中,我们自身常常也是危害的源头。因此危害和灾难所呈现的问题必须置于对整个环境的总体社会适应模式中来理解。

文化人类学的传统观点认为,狩猎—采集移动模式、产后性交禁忌和群体的聚合这样的行为,均是对特定环境的危险的有效适应措施。^[10]实际上人类学界在研究生活在紧张和危险状态下的人口,且从适应的观点来定位研究方面,具有悠久的传统。不过,危害的源头不仅仅局限于在环境中发现,环境的压力和危害的脆弱性因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力量而不断加剧,迫使人们既要适应于一个机制的,也要适应于一个自然的环境。

从适应性的观点来看待灾难,容许和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所有社会的适应度,特别是那些传统被看作是已经控制和支配了它们的自然环境的社会。对危害和灾难的适应问题目前也伴随着对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和目前环境的退化和污染程度的关怀。从适应性的角度来看,日益增加的危害和灾难与环境退化的新兴关系对长期的可持续性,或者说对工业社会的适应度提出了挑战。

回到前面提到过的问题,如果我们将“因”与“果”问题分离(即“为什么—什么”的问题),实际上我们是将危险从灾难、环境从社会中分离出来。将二者分离也是将脆弱性的问题,或社会的那些不利于所有或一些成员的生存的特征从讨论中剥离出去。文化适应或者如多姆布劳斯基(Dombrowsky)所指的文化“保护”的欠缺和崩溃,^[11]当然是灾难研究与实践的关键问题之一。把危险和灾难分离出来,我们将社会从这二者合

成的自然世界剥离。在每次灾难中,“为什么”(why)是隐含的,因为灾难要么没有发生,要么不严重——如果一社区成功适应其环境的话。灾难的发生与严重程度是我们衡量成功适应环境的一种举措。

如果原因在定义灾难中是一合适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形成一种替代性观点来理解为什么灾难发生和为什么会采取它们所采取的形式发生。我在呼吁一种涵盖因与果的视角时,并不是要倡导回归一种简单的环境“危险”研究方法,如贺维特批评的那样,将灾害的起因归结为环境的力量。我主张一种更细微的方法来探讨社会与环境的关系,着重它们的同构、交汇和适应。从实际来讲,以自然或社会为焦点的灾难定义争论是毫无意义的二元论。理解和定义灾难,焦点应汇聚在社会与环境的交叉,着眼于社会对整个环境的适应,包括自然的、改造过的和建构起来的环境以及社区作为其部分的过程。

我们在对灾难的理解中采用适应性尺度的缘由是基于一种事实:人类社区及其行为不是那样简单地置于环境之中。如英戈德(Ingold)所说,社会与环境之间的交汇不是“不同领域之间的外部联系”^[12]。社会是在自然中建立和形成的,正如自然是文化建构,也被社会从物质上加以改变的。而且这种相互构建并非是静态的,而是活跃、复杂和发展的互动过程。社会与环境并非分离,二者是相互勾连和互惠形成的实体。环境特征和进程为社会所界定和结构,就如社会成分获得环境的特点和表述。社会的发展推进了环境的发展,二者之间的互动通过它们之间疏松和游移的边际,在许多持续的交流过程中得以显现。因此,社会与环境彼此渗透、共同构建一个世界,并且以自然或改造与建构的环境为张本,涵盖了交流和行动的可能性,也包括了人及其文化构建的技能和能力。

因此,灾难产生于社会,而不是发生在自然界。不过,灾难不完全是形成于社会,而是从社会—环境关系和这些关系的机制形式上呈现。灾难形成的框架或场景是人类社会和文化的系列互动和相互构建过程,各自都有其自身的内在运作机制,也是自然界的过程;自然本身也具有内在运作机制和自我协调过程。灾难因此就被定义为人类系统在理解和探索这一系列关联系统的互动关系的失败,其结果就是造成了文化保护的崩溃,而其后果就被称为灾难。灾难可以从社会、物质和自然系统的交汇中形成,使人类的文化难以维系。

由于我们对自身行为的后果以及对那些自动机制系统的了解还远远不够,失败的风险也就相当高。

就人类学来说,最好是以联结社会(个体和群体的组织与关系)、环境(联结物质世界的网络,人与群体在其间构成)和文化(价值观、规范、信仰、态度以及与组织和关系有关的知识)的关系网络来思考灾难。

七、灾难的政治生态学取向

一人口群和一潜在的破坏性因子的结合并不一定会产生灾难。社会的脆弱模式,或者其适应性的缺失,才是灾难的基本因素。灾难的不可避免是由构成社会的这些因素造成的,即历史形成的脆弱模式、散布于地方、基础设施、社会政治结构、生产方式和意识形态之中。脆弱模式会在一场灾难的生活史中界定个体和组织的行为,其程度远胜破坏性因子的物质力量。

复杂的内部分化,作为除早期外社会文化整合各阶段的特征,可以在短期和长期以全然不同的方式分配适应的效力。从这点来看,从社会的制度发展起来的适应模式也许具有普遍的效力,或者仅对那些受社会权力关系或生产和分配方式青睐的有效,而对那些不受青睐的无效。同样的适应模式,尽管在短期内对一些或许多相当有效,也许在长期内则会种下日后脆弱性和灾难的种子。

要在构成当代人类社会主要特征的复杂的内部分化场景下理解灾难,因此需要结合分析策略的生态框架,以能涵盖环境特征、进程和资源与生产方式、分配和社会内部分化的性质、形式和影响之间的交汇。作为适应系统的复杂社会,受社会内部竞争利益的支配,对某些群体强化安全而将别的置于系统风险和危害中,这也是任何有效的研究策略需要加以理解的。

从实际来说,需要建立一门灾难的政治生态学。政治生态学通过聚焦于社会中的人、环境和社会政治结构之间的关系,将以生态为基础的社会科学视野置于政治经济的框架之中。灾难的政治生态学观点探讨的是一人口群——其社会产生的和政治上强化的生产和分配模式与其物质环境的能动关系,所有这些都构成了脆弱性以及灾难的应对模式。

人类—环境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一人口群从其周围环境中获取生活资源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和价值观来建构和表述出来的。政治生态学的研究方法认为,人类在寻求食物和住所的过程中对物质环境的利用和改变而形成的社会制度安

排,是灾难演进的主要因素。政治生态学的分析讨论是围绕灾难——具有威胁性或已发生的,其状况如何型塑灾难的演进。对于那些影响发展因素,造成对社会经济和环境形成的危害脆弱的结构,政治生态学尤其加以重视。

这一观点与最近有关发展与环境退化的看法和相关的灾难研究取向有不少的趋同。基本的观点是——灾难发生的一个必要但并非充分的条件是至少二个因素的重叠:一人口群和一潜在的破坏性因子。社会与破坏性因子相互构建,作为随时间流转的过程嵌于自然和社会系统中。社会和破坏性因子明显是过程性的现象,二者也将灾难界定为一种过程性现象而非孤立的、时间上被定格在准确的时间框架中的事件。

如果脆弱性被看作是理解灾难的根本,那么时间的问题就变得很重要。我主张在一个具体的事件为中心的媒介显现之前,就开始灾难的生活史研究。实际上,在某些状况下灾难成为了任何人类系统在其第一组织时段和在相对固定的位置的部分缩影。社会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通过社会文化适应降低或增加相关灾害的脆弱性。政治生态学的方法看起来是最能够涵盖灾难的缘由和生产、其作为社会和环境进程和事件的进展、其社会文化的构建和对于整个社会文化适应与社区演进的影响。

八、结束语:全球变化中的灾难定位

环境中物种的成败问题向来就是适应研究的重心,不过,现在也必须延伸到环境自身作为自我调节系统的生存能力。鉴于目前危险和灾难的性质和数量的变化,对危险和灾难的概念和方法进行恰当的反思具有一定的紧迫性。从人类学的观点来说,一个社会对环境的适应程度的好坏现在应该与环境与社会的相处程度连接在一起。相互关系的问题现在位于前列。在这种相互关系中,灾难相比过去更加表现出不平衡。

很明显,世界上某些活动的持续扩张限制了人类的适应能力和自然界的张力。这些界限的逾越就造成了我们最基本的自然资源(如空气、水和土地)中的一系列广泛的问题。尽管短期内不明显,这些问题通常慢慢地集聚势头,直到它们在当地的环境中产生快速变化,对人口群的健康、资源的再生和社区的福祉造成了消极的影响,因此,它们导致了严重程度不同的灾难。生物物理现象日益增加的全球化从社会层面与贸易和移民的全球化交织在一起,二者强化了联系的进程,也在扩

大了的空间和缩短了的时间里形成了问题。基本的原因和诱发性因子,包括当今地方性问题的答案,或许只有在地球的另一边才能寻找到答案。如贺宁(Holling)所断言,这些全球化进程造成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其缘由是非线性的,在空间和时间上也是断续的,因而具有内在的不可预测性。这样的非线性和断续性排除了人类传统的适应性反馈。由于无法观测变化的信号,人们也无法采取应对策略。当代社会和自然系统现在已经进入了全新的和不可知的领域,其交融的新形式开始产生进化的影响。由于人类比以前任何时候在全球范围的投入更大,实际上,人、社会和自然在同步进化方面正在开启新的篇章。人类、社会和地方与全球的环境而今以全然陌生的方式和强度相互影响,对适应能力和结构与组织的传统知识都提出了挑战。^[13]

对灾难的研究来说,这些结语的涵义是很深刻的。它们强调灾难的性质植根于人类社会和自然系统之间的共同进化关系,促使我们加强努力,在区域和全球的层面,探索其间的联系,以及它们如何在我们的社会和环境形成破坏力。我们观察到环境问题显现时,怎样在灾难形成之前预测和减弱其影响?灾难目前正变成在地球上日益强化的前兆性事件之过程,我们对灾难的研究定义和方法也必须反映其现实。

注释:

①本文原文为“*What is a Disaster?*”: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a Persistent Question*,见 Anthony Oliver-Smith 和 Susanna Hoffman 编《*The Angry Earth: Disaster i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愤怒的地球:人类学视野中的灾难》),本文的翻译和出版,由 Anthony Oliver-Smith 和 Susanna Hoffman 专门授权。

②参见下列研究成果: C. Fritz. 1961. “Disasters,” in R. K. Merton and R. Nisbet(eds.), *Social Problems*, pp. 167-198.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G. Baker and G. Chapman. 1962. *Man and Society in Disaster*. New York: Basic Books; A. Barton. 1969. *Communities in Disaster*. Garden City: Doubleday.

③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是1995年4月19日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首府俄克拉荷马城发生的一起利用汽车炸弹对一座联邦办公大楼发动的恐怖袭击事件。事件共造成168人死亡,超过800人受伤,是“9·11”袭击事件发生之前在美国本土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恐怖袭击事件。

④三里岛核事故(Three Mile Island-2)指的是1979年3月28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三里岛核电站发生的历史上最严重的核泄漏事件。

⑤1965年洛杉矶市瓦茨区发生了震动美国社会的黑人骚乱。是年8月11日,洛杉矶市警察以车速过高为由,逮捕了1名黑人青年。事件发生后,该市瓦茨区的黑人与警察发生冲突,这次骚乱造成34人死亡,1032人受伤,财产损失达4千万美元,经过一个

星期的火烧和劫掠,瓦茨聚居区毁于一旦。

⑥印度帕尔灾难是历史上最严重的工业化学意外,影响巨大。1984年12月3日凌晨,印度中央邦的博帕尔市的美国联合碳化物属下的联合碳化物(印度)有限公司设于贫民区附近一所农药厂发生氰化物泄漏,引发了严重的后果。大灾难造成了2.5万人直接致死,55万人间接致死,另外有20多万人永久残废的惨剧。

⑦该引文转引自 B. Porfiriev 1995. “Disaster and Disaster Area: Methodological Issues of Definition and Deline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ss Emergencies and Disasters* 13, 3: 285-304.

⑧参见 T. E. Drabek. 1986. *Human System Response to Disaster*.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参考文献:

[1] E. Quarantelli. 1995. “What is a Disaster? (Editor’s Introduc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ss Emergencies and Disasters* 13, 3: 221-230.

[2] A. Kroeber and C. Kluckhohn. 1932. *Cultures: 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3] L. Wittgenstein. 1973.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 inc.

[4] W. Gallie. 1955. “Essentially Contested Concepts.”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56: 167-198.

[5] E. Quarantelli. 1985. “What is a Disaster? The Need for Clarification in Definition and Conceptualization in Research,” in S. Solomon (ed.), *Disasters and Mental Health: Selected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pp. 41-73.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House.

[6] G. Kreps. 1995. “Disaster as Systemic Event and Social Catalyst: A Clarification of Subject Matt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ss Emergencies and Disasters*, 13, 3: 255-284.

[7] T. Horlick-Jones. 1995. “Modern Disasters as Outrage and Betray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ss Emergencies and Disasters*, 13, 3: 305-316.

[8] K. Hewitt. 1995. “Excluded Perspectives i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Disast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ss Emergencies and Disasters* 13, 3: 317-340.

[9] A. Wallace. 1956. *Tornado in Worcester (Disaster Study # 3)*. Washington, DC: Committee on Disaster Studie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10] M. Sahlins. 1972. *Stone Age Economics*. Chicago: Aldine.

[11] W. Dombrowsky. 1995. “Again and Again: Is Disaster What We Call ‘Disaster’? Some Conceptual Notes on Conceptualizing the Object of Disaster Sociolog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ss Emergencies and Disasters* 13, 3: 241-234.

[12] T. Ingold 1992. “Culture and the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n E. Croll and D. Parkin (eds.), *Bush Base and Forest Farm*, pp. 39-55. London: Routledge.

[13] C. S. Holling. 1994. “An Ecologist’s View of the Malthusian Conflict,” in K. Lindahl-Kiessling and H. Landberg (eds.), *Popul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Environment*, pp. 79-103.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